

## 家庭教育政策与其实践：以香港的家长教育为例

陶兆铭 姚简少薇 蔡冠华 陈廷三

**摘要：**香港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家庭教育，更于2007年成立家庭议会，以协助制定全面支持家庭的措施和协调与家庭相关的政策，提倡重视家庭观念，推广以家庭核心价值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原动力。由于家长教育一直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元素，因此本文以香港的家长教育为例，探讨现时香港家长教育的政策与其实践的现况。此外，本文尝试透过评估一项以推广“父母个人生命转化”与“家长互助”为本的家长教育计划的成效，从而发掘家长教育的方向与焦点。研究结果显示，这项家长教育计划对参加者的亲职经验、亲职满意度、亲职效能及家庭关系有明显的正面影响。参加者也认为以小组分享形式进行的家长教育能使他们体会到家长之间彼此学习和互相支持的重要性。针对研究结果，本文尝试探讨影响家长教育成效的要素，并提出相关建议。

### 引言

鉴于家庭教育有促进家庭关系、提升家庭抗逆力、改善家庭生活素质

的功能 (McCubbin & Mccbbin, 1988; Working Group on Evaluation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Service, 1982)，近年来不同国家与地区均将此纳入家庭政策的重要范畴。举例来说，在英国，教育部负责制定家庭教育及家庭支持政策；在美国，相关政策也主要由教育部负责，并以针对低收入、少数族裔及弱势家庭的需要为主 (Long, 1997)；在澳大利亚，“家庭、房屋、社区服务及本土事务部” (Department of Families, Housing, Community Services & Indigenous Affairs) 负责家庭及家庭教育政策的相关事宜；至于我国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在2002年订立了“家庭教育法”，详列了有关家庭教育的执行细节 (劳贤贤, 2007)。由此可见，不少国家与地区视家庭教育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透过不同方法及策略促进个人投入家庭生活、巩固与提升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协助家庭发挥力量及潜能，最终有助维持家庭的稳定性，以及提升家庭的社会及文化资本 (Arcus & Thomas, 1993; Shulruf, O'Loughlin & Tolley, 2009)。

香港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推行家庭教育，旨在鼓励市民重视家庭生活、预防家庭及社会问题、推广和谐的家庭与人际关系，以及协助家庭发挥功能 (社会福利署, 2011; Working Group on Evaluation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Service, 1982)。鉴于家长教育一直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基础，也是其主要的元素 (黄郁文, 1996)，因此，本文尝试以香港的家长教育为例，探讨香港家庭教育政策的特色和发展方向。

家长教育传统上是指由家长教育专家所提供的一套有系统的课程与活动，用以增加父母的育儿知识、能力与技巧，以及改善亲子关系 (Harman & Brim, 1980; Venkataiah, 2001)。在香港，家长教育被定义为关于如何提升不同年龄阶段子女的身体、智能及心理社会发展素质而需要的亲职态度、知识和技巧，亦包含协助父母提升处理技巧、沟通技巧、解难技巧及支持其个人发展 (Leung, Tsang, Pang, Cheng, Chan, Lai, Ng & Lo, 2003)。现时，香港的家长教育主要由三个界别提供，包括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及卫生界 (Tam, Lam, Cheng, Ho & Ma, 2001)。

社会福利界方面，社会福利署自1979年开始支持及拨款给社会福利机构，让其提供家庭生活教育服务，迄今三十年。在2000年，社会福利署委托香港大学检讨了全港的家庭服务，并根据该检讨报告成立一站式的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整合家庭服务的不同范畴，并把家庭生活教育融入综合家庭服务之内。现时，家庭生活教育服务致力达到以下目标（社会福利署，2011）。

(1) 帮助家庭成员履行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任务、协助家庭适应改变及应付特殊需要和压力；

(2) 增加家庭成员对自己及其他家庭成员的了解、帮助他们与家人维持及提升亲密关系；

(3) 向个人传授家庭生活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面对生活上的种种需求与困难，并培养其对家庭的责任感，发挥个人与家庭的潜能。

除了家庭生活教育服务外，学校社会工作、青少年中心及青少年综合服务队等也会提供各式各样的家长教育活动，如家长讲座、嘉年华会、文娱表演、义工服务、工作坊、课程、互助小组等。

教育界方面，教育统筹委员会于《第四号报告书》确认了家长与学校合作的重要性，并于1993年成立了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宗旨乃培养家长和教师对家校合作及家长教育的积极态度，委员会并透过政府拨款，在全港的幼儿园、小学及中学推广成立家长教师会及地区性的家长教师联合会。家长可通过参加其子女就读学校的家教会，或地区性的家长教师联合会，加深对子女、学校和本港教育政策的认识（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2011）。学校的家长教师会每年会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提倡家校合作及家长教育，而地区性的家长教师联合会则会定期提供家长训练、举办亲子活动、招募家长义工等等。

至于卫生界方面，卫生署下辖的家庭健康服务部推行的家长教育，主要是针对幼儿家长，透过向家长传授育儿所需的知识及技巧，从而提升亲职成效、促进亲子关系，以及减少儿童行为问题（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2011）。家庭健康服务部采用了双轨的预防方式，向公众提供“共享育儿乐”普及课程，并向遇到困难的家長提供“正面亲职计划”（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部，2011）。

此外，行政长官于2007~2008年度的《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家庭议会，由政务司司长领导，制定社会政策及规划相关服务，以维系及强化家庭，推动家庭作为社会核心的主流价值观（家庭议会，2011）。家庭议

会的成立，标志着香港政府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并反映了政府正视到香港有制定家庭教育政策的需要。然而，值得探讨的是香港的家庭教育政策是否需要进一步清晰化和具体化？若然需要的话，可以在哪方面加强阐述和推行？

## 对现时香港家长教育政策及服务的反思与评述

家庭议会的成立，可视为响应现时由不同界别及部门分别推行家庭教育这种各自为政的情况，以制定全面支持和强化家庭政策的策略。在家长教育的范畴上情况亦然。家庭议会的文件及网页中多反复重申其提倡重视家庭观念、推广家庭核心，以及巩固亲密和睦的家庭关系之目标，却没有细致地提及家庭教育及家长教育政策的方向和策略。更重要的是，各个界别及家庭议会均没有就家长教育的核心概念作具体的阐述，也没有推行家长教育的详细框架及蓝本，供服务提供商及大众参考。

再者，虽然不同界别分别推行不同类型的家长教育，但整体来说，现存的家长教育主要以关注子女的成长为中心，即认为家长教育最重要之处是教授家长一套“有效”的教养子女模式。相关的服务也把重点放在增加家长育儿的知识和技巧之上，着重培育子女的学习能力与才艺发展，以及改善其行为表现（Lam, 2003）。然而，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有不少父母为提升孩子的竞争力，竭力培养孩子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为子女安排大大小小的培训课程与课外活动，以致为人父母者压力有增无减，容易成为过分关注子女成长（hyper-parenting）的一群（Furedi, 2008; Honoré, 2008）。另一方面，社会上却弥漫着“港孩”的论述，意即越来越多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过分依赖父母，缺乏一般生活技能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我们需要更深入研究这种社会论述的真确性与其含意，但无论如何，这个社会议题显示了以“子女为本”的家长教育的不足之处，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家长教育的意义与宗旨。

其次，研究显示，尽管不同的家长教育课程向家长传授不同的育儿知识与技巧，使能适切不同家长的需要，但事实上，很多参加的家长未能深入明白这些知识和技巧背后的意义与自身的关系，在接受训练后，往往因

未能掌握和善用这些知识与技巧，故难以于日常生活中充分运用（陶兆铭、姚简少薇、蔡冠华，2011；Hills & Knowles, 1987）。此外，亦因为缺乏对亲职信念和选择为人父母等各方面作出深入的检视与反思，在实践方面往往感到迷乱（First & Way, 1995）。

因此，有不少学者指出，家长教育的焦点，应以“父母个人生命转化”为本，亦即集中探讨亲职生涯的意义和为人父母的生命关怀（简文英、卓纹君，2003；Chan, 2000；First & Way, 1995；Lam, 2005；Hannush, 2002）。这种取向强调家长生涯是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当中充满了成长的机遇与挑战。而亲职实践的改变，便是建基于父母对亲职身份的肯定与承担，以及其如何整合个人成长与亲职的历程。在整合的过程中，父母能增加其个人觉醒，发掘自己的个人特质与家长特质，深化与子女的联系，再推动整个家庭系统作出正向的改变。

由此可见，家长教育的政策与服务，理应有一个明确的基础和介入点，就是协助父母探索亲职的意义，提升其对亲职生涯的向往和投入。这不代表探讨亲职实践的方向与技巧并不重要，而是应先协助父母整理自己，再帮助他们发掘适合自己与其子女的育儿方法，并强调在不同的家庭生活周期里也会有不同的挑战与机遇。

另外，现存的家长教育往往假设父母需要家长教育专家协助装备亲职的知识和技巧。然而，这个假设往往令父母深信专家比他们自己更清楚子女的成长需要，甚至令父母盲目跟从专家的建议，而没有好好关注自己及其子女所面对的独特处境（Furedi, 2008）。家长聚焦于自己的不足，怀疑自己亲职的资格与能力，只会令自己对育儿产生更大的焦虑，失去作为父母的信心，漠视自己的个人资源（Lam, 2003）。除此之外，这种单向的家长教育，忽略了家长本身拥有的社会资本，亦即家长之间互相学习与协助对方的可能。不少研究指出，透过聆听与响应别人的经验分享，参加者能加深自己对人生与亲职的觉醒和体会，并从中实践彼此关顾和支持。这种以“家长互助”为本的家长教育，是令其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元素（Solomon, Pistrang & Barker, 2001；Wolfe & Haddy, 2001）。故此，家长教育政策与服务的另一个焦点，便是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家长建立支持网络，令家长教育能响应不同家长的需要，肯定家长的能力，从而巩固家庭的凝

聚力。

针对现存家长教育在家庭教育政策之下的不足之处，本文尝试透过一项探索性研究，以探讨强调“父母个人生命转化”与“家长互助”为基础的家长教育的可行性，并据此检视与反思家长教育于家庭教育政策内的方向。

## 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初步评估一项以推广“父母个人生命转化”与“家长互助”为本的家长教育计划的成效，透过量化与质性评估方法，探讨家长参加整项计划后，在亲职经验及家庭关系方面是否有正面的改变，以及他们对该计划的观感与意见。

整项家长教育计划的目的是希望透过个人成长和亲职反思，以及家长之间的分享和交流，协助参加者对亲职生涯有更深刻的体会，提升他们对亲职的投入和承担，深化与子女的联系，以及建立家长彼此关爱及互相支持的文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讲座，共分为三节，每节五小时，讲座内容围绕亲职意义的反思与重检，以及父母自身的成长需要、压力与承担。第一阶段完成后，有兴趣及合适之参加者便进入第二阶段的工作坊。工作坊合共三节，每节五小时。参加者被分为五组，每组由一位曾受家长教育训练的导师协助带领小组活动。工作坊以体验式学习方法进行，透过自身的了解、生命回顾、家的体会、亲职意义重拾、感遇知恩、宽恕、放手及生命整合等活动，促进参加者的个人成长及提升其亲职与家庭效能，让参加者在家长教育方面有所反思和得到启发。

## 资料收集

本计划招募了 57 位参加者出席第一阶段的讲座，其中有 31 位参加者进入与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工作坊。研究小组在第一阶段的讲座开始前，派发了客观成效前测问卷予参加者填写。在第一阶段最后一个讲座完成当日，研究小组派发第一阶段主观成效问卷，以收集参加者对讲座之响应。

第二阶段完成后，小组派发第二阶段主观和客观成效后测问卷予参加者填写。

另外，研究小组在计划完结后安排了三节聚焦小组，透过随机抽样邀请了16位完成了整个计划的家长参加。该三节聚焦小组分别安排于三个晚上举行，每节时段约一小时三十分。聚焦小组由研究小组成员带领讨论。当中出席的家长，均曾参与计划中的讲座和工作坊。聚焦小组的讨论集中了解参加者在讲座和工作坊中的得着、体会和意见。

### 量化评估测量工具

在主观成效评估方面，本研究制订了“参加者满意度问卷” (Participant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及“家长教育满意度量表” (Parent Education Satisfaction Scale)，以量度参加者对本计划的整体满意度、对导师表现的满意度，及对亲职的帮助。参加者满意度问卷乃根据案主满意度问卷修改而成 (Larson, Attkisson, Hargreaves, & Nguyen, 1979)。家长教育满意度量表则参考自家长满意度问卷 (Cheung, 1996; Poertner, 1985)，然而，因家长满意度问卷倾向针对“以子女为本”的家长教育 (陶兆铭等, 2011)，为求配合“以家长为本”的家长教育，因此，本研究制订了另一份量表，以评估参加者对导师的表现及对学习目标之达成的满意程度。

在客观成效评估方面，本研究采用了“亲职力量量表”以量度家长参与计划后在亲职经验方面的转变，并运用“华人家庭评估工具”量度其在家庭关系方面的转变。亲职力量量表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 由 Gibaud-Wallston 及 Wandersman 于 1978 年制订，用以评估家长对实践养育子女这职份的观感 (Johnson & Mash, 1989)。该量表可分为两个次量表，即亲职满意度次量表 (Satisfaction Subscale) 及亲职效能感次量表 (Efficacy Subscale)，并由 Ngai, Chan 及 Holroyd (2007) 翻译为中文。

华人家庭评估工具 (Chinese Family Assessment Instrument) 则由 Shek 于 2002 年制订，用以量度华人社会的家庭功能 (family functioning) (Shek,

2002)。量表共有 33 个题目，本研究只抽取其中 21 题，以量度家庭关系的变化，包括家人的相互关系 (mutuality)、家人沟通与家庭凝聚力。

表 1 量化评估测量工具信度

测量工具	问题数目	Cronbach's alpha
参加者满意度问卷	5	.81
家长教育满意度量表(导师表现)	4	.84
家长教育满意度量表(学习目标)	10	.90
亲职力量量表(亲职满意度及亲职效能)	17	.87
华人家庭评估工具(家庭关系)	21	.97

### 聚焦小组访谈问题

是次研究采用了“导引式访谈” (Rubin & Rubin, 1995)，亦即主持人把聚焦小组访谈所要涉及的主题先以纲要的方式预备，但在实际访谈时则依当时的情境决定问题的次序。现将访谈问题大纲详列如下。

1. 请问你对第一阶段计划各项讲座有何观感与意见?
2. 什么驱使你参加计划的工作坊? 你参加工作坊前，对工作坊有什么期望?
3. 请你分享自己在工作坊的小组中一些深刻的经验和体会。
4. 小组的气氛和沟通能令你畅所欲言吗?
5. 小组的气氛和沟通能令你于亲职教育上得到支持和启发吗?
6. 参加了这个计划的工作坊后，对你理解亲职的意义和实质履行亲职有什么改变?
7. 你觉得在工作坊内，除了于亲职、亲子关系和培育子女等方面的学习外，于个人方面，有什么成长的体会?
8. 你觉得工作坊哪部分和哪些环节/活动对你最有帮助? 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9. 工作坊对为人父母的感受和价值有何影响?
10. 工作坊在哪些方面能满足/符合你的期望? 哪些方面未能满足/符

合你的期望？为什么？

11. 你对工作坊整体有何评价？

## 研究结果

在本计划中，总共有 31 位参加者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讲座及第二阶段的工作坊。参加者以女性为主，占近 80%。参加者年龄以 41~50 岁为主，占 45%，其次为 31~40 岁，约占三成。近 60% 的参加者拥有大专、大学或以上学历，其次为中四至中七学历，约占 30%，可见参加者教育程度颇高。近 60% 参加者拥有全职工作（包括全职雇员、自雇人士及雇主），也有约 25% 的参加者留家处理家务。近 80% 的参加者为已婚人士。较多参加者有宗教背景，约占 55%，当中主要为信奉基督教及佛教人士，而没有宗教背景的则占 30%。超过 60% 的参加者家庭每月有 MYM30000 港元以上的收入，其中家庭收入为 MYM50000 港元或以上的更约占 20%，可见参加者的家庭经济环境颇佳。

在主观成效评估方面（见表 2），研究发现，参加者对本计划及导师的表现均非常满意，平均评分为 15.51，平均值接近该部分的总分。而且，参加者认为计划对亲职有很大帮助，平均评分为 36.16。此外，参加者对计划的整体满意度，平均评分为 18.34，表示参加者十分满意计划整体的安排。

表 2 主观成效评估结果

主观成效评估部分	答题人数	该部分最低/最高总分	平均评分	标准偏差
1. 对计划的整体满意度	31	5/20	18.34	1.86
2. 对导师表现的满意度	31	4/16	15.51	1.12
3. 计划对亲职的帮助	31	10/40	36.16	3.96

在客观成效评估方面，本研究采用了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参加者在计划（讲座及工作坊）前后亲职经验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化。结果显示，参加者在完成计划后的亲职经验，比在参加计划前有显著的正面改变（见表 3）。

表 3 参加者于计划前后亲职经验的变化 (N = 26)

	计划前平均值 (标准偏差)	计划后平均值 (标准偏差)	<i>t</i> 值	<i>p</i> 值
亲职经验	69.35 (11.40)	77.74 (8.40)	5.93	< .01

注：平均值越高表示亲职经验越正面。

另外，该量表可再分为两个次量表，以评估参加者在亲职满意度及亲职效能方面的改变情况。结果显示，参加者在完成计划后的亲职满意度，比在参加计划前有显著的正面改变（见表 4）。在亲职效能方面，参加者在完成计划后比在参加计划前也有显著的正面改变（见表 5）。

表 4 参加者于计划前后亲职满意度的变化 (N = 26)

	计划前平均值 (标准偏差)	计划后平均值 (标准偏差)	<i>t</i> 值	<i>p</i> 值
亲职满意度	36.04 (6.09)	38.97 (5.12)	3.27	< .01

注：平均值越高表示亲职满意度越高。

表 5 参加者于计划前后亲职效能的变化 (N = 26)

	计划前平均值 (标准偏差)	计划后平均值 (标准偏差)	<i>t</i> 值	<i>p</i> 值
亲职效能	33 (6.12)	38.54 (4.45)	7.44	< .01

注：平均值越高表示亲职效能越好。

在家庭关系方面，研究结果显示，参加者在完成计划后的家庭关系，比在参加计划前有显著的正面改变（见表 6）。

表 6 参加者于计划前后家庭关系的变化 (N = 28)

	计划前平均值 (标准偏差)	计划后平均值 (标准偏差)	<i>t</i> 值	<i>p</i> 值
家庭关系	83.21 (15.63)	88.21 (13.39)	2.77	= .01

注：平均值越高表示家庭关系越好。

## 聚焦小组访谈资料分析

透过汇聚参加者对参与计划的经验叙述，并就这些叙述进行编码与主题分析，本研究归纳出以下两个最主要的发现。

### 对家长教育的意见

参加者表示坊间社区所提供的家长教育活动或课程，着重针对家长如何教导子女成为优才，而忽略对家长自身和对子女的终极关怀。参加者从讲座和工作坊中，了解了后者的重要性。参加者普遍赞同家长教育应强调家长“关爱自己”“感遇知恩”、对子女“终极关怀”和“无憾无悔”，以及“由己出发”教养子女等讯息，并期望这“助人自助”的启示能于家长教育中广泛推展开去。

我认为现在于坊间有很多社区活动或者课程，全部主要是针对家长应该怎样教导子女，怎样培育子女成为优才。针对家长个人成长的课程从来是很少的，其实子女成长好与坏或者健康与否，的确是承上启下的。(B先生)

其实我认为这个课程不是确确实实地教你一些技巧，课程帮你明白到，要整理好你的人生，提醒我们人应该简单点，怎样对自己、小朋友给予爱……此外，我每一次上完课程，回公司，都会跟同事分享课程所学，我觉得十分好。(I女士)

### 对小组形式的家长教育的意见

各参加者很赞赏小组形式的家长教育，认为小组能提供机会让参加者抒发自己的感受，分享经验，互相扶持，扩阔参加者的反思空间。参加者从组员分享中亦体会，要感恩的人，除了自己的家人和长辈外，还有自己的孩子。这份珍贵的情怀，令参加者变得豁达和开窍。整体而言，参加者认为相对于讲座中的讲授，在工作坊内，小组的交流更能发挥深化的作用。

在工作坊中，有时会遇到一些跟自己问题差不多的人，感觉上觉得，自己的问题，原来都不是太大。如果你只是听讲座，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我参加的那一组，有一个组员处境跟我一样，大家都是受到这个问题困扰，原来大家把自己的问题分享出来后，才发现大家都是遇着相同问题，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M女士)

我觉得工作坊是十分有用的，因为它是可以使你实实在在定下来，去思考，去想问题，可能我过往不会深入去想一些艰深的问题，过去了就罢了，但工作坊通过一些游戏，使我很认真地去对待每一件事。(G女士)

## 讨 论

研究发现，这项以“父母个人生命转化”为本的家长教育计划，对参加者的亲职满意度、亲职效能及家庭关系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聚焦小组资料也显示计划深化了参加者在亲职经验与家庭关系上的思考和领悟。由此可见，这种取向的家长教育并没有排除提升亲职能力及家庭关系的重要性，然而，要达到这些目标，家长教育应该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促进家长关注自身的成长需要、整理自己的人生经验，以及重新寻觅自己的人生方向。当家长体验到个人的整合与转化，他们便会更欣赏与珍惜自己的亲职历程，增加对为人父母的向往、投入与承担，从而探索培育下一代的目标与方向。正如 Chan (2000) 指出，家长教育应以协助父母重整自己的生命历程、培养其创建能力 (generativity)、肯定和发展个人的亲职潜能为主，从而促进父母个人的自我实现，强化父母与子女的骨肉之情。

研究结果亦显示，相对于以单向形式传授育儿知识与技巧的课程，本计划更着重运用小组工作手法进行家长教育。透过建立一个互相支持的环境，让参加者分享、聆听与响应别人的故事，加深自己对人生与亲职的体会，甚至反思与挑战自己固有的信念。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家长之间的支持网络，能够提供一个支持加油站予为人父母者 (Wolfe & Haddy, 2001)，让他们在当中彼此关顾与守望，一起面对亲职的机遇、需要和挑

战 (Solomon et al., 2001)。

研究亦发现,这种不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家长教育,着重为人父母的个人成长和经历反思,提升家长的个人醒觉与生命关怀,以培育其对亲职的投入和承担,与中国儒家传统重视“反求诸己”的内省学习颇为吻合,亦与其“修身齐家”这种由内而外之实践精神如出一辙 (Hwang, 2001; Tu, 1985)。这种以父母为本,并跟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结合的家长教育,能补足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家长教育的潜在问题。举例来说,西方家长教育的理念多建基于个人主义,而 Fowers 与 Richardson (1996) 指出,这种意识形态容易使家庭服膺于个人利益,削弱家庭成员的联系及个人对家庭的投入和承担 (石丹理、赖敏飞, 2000)。相异于个人主义,参与者透过本计划体会到“对子女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这份“爱”超越了责任的枷锁,亦非无奈的承担。这正与中国文化珍视骨肉之情、强调血浓于水的家人关系互相呼应。骨肉之情的深化能为父母提供更大动力,克服各种亲职困难和障碍。再者,有不少学者 (Chan, 2000; First & Way, 1995; Hannush, 2002) 也认为,促进父母自己的个人成长、巩固他们与子女的骨肉联系和建立亲密持久的家人关系,能有效地培育下一代独立生活的能力,发挥天赋生命力,以及修正偏差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整体来说参加者的家庭经济环境虽然颇佳,但亦有部分家长来自低收入及一般收入的家庭。然而,质性研究发现不同社会背景的家长在过程中亦能投入参与,互相支持,这与工作坊不以理论为主导,而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有莫大关系。事实上,文献显示对低收入家庭及有特殊需要的家长(如子女为伤残或智障人士)来说,家长之间的互助网络比透过专业人士教授其育儿知识和技巧更能切合他们的需要、更能帮助他们在困难的生活中体验温暖和希望,使他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和挣扎中,不用孤独前行,亦令家长教育的推行更有持续性 (Solomon et al., 2001)。

## 建 议

研究发现,参加者在经历了这种以“父母个人生命转化”为本的家长教育后,在亲职经验、亲职满意度、亲职效能及家庭关系上均有显著的

正面提升。由此可见,家长教育要有成效,必须建立在一个巩固的基础之上,亦即提升家长的个人醒觉、引导他们了解其生命关怀,及检视自己对为人父母的信念和方向 (简文英、卓纹君, 2003; Chan, 2000; First & Way, 1995; Lam, 2005; Hannush, 2002)。由重新审视家长教育的意义推展到家庭教育方面,有关当局应更深入地检视家庭教育的意义与目标,将基础建立在促进家庭成员的个人成长上,以强化个人在家庭中的投入感和责任,深化家庭中的亲密关系。

聚焦小组研究结果显示,参加者十分欣赏以小组分享模式进行的家长教育,认为这种模式能促进家长彼此学习、互相支持,令他们能深化所学。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互助为本”的家长教育 (Lam, 2003; Webster-Stratton, 1997),主张建立人际互助网络,提升同侪之间的关爱与支持,以及强调家长与学校及社区协作,一同营造有利个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实在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镜。家庭教育工作者可以透过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家长建立互助网络,鼓励及培养更多家长参与家长教育的工作,为家长教育增添新的同行者,帮助推广和联系其他家长,从而令家长网络有更长足的发展,及回应不同家庭的诉求。

最后,本地有关家长教育成效的研究,绝大部分以亲职实践、亲子关系及子女成长的转变为主要量度的指标 (陶兆铭等, 2011)。本研究透过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将焦点集中在父母生涯的成长、对亲职意义的了解,以及家庭关系的增进等方面来评估家长教育的成效,希望能扩大家长教育成效的评估范畴。事实上,学术界值得投放资源设计各式各样的评估方法与验证针对不同范畴的量度工具。社会亦应增拨更多资源进行评估家长教育成效的研究,从而比较不同取向和种类的家长教育的利弊得失,以及探讨有效推行家长教育的成功因素。

## 参考文献

- 石丹理、赖敏飞：《中国儒家思想有关“理想”家庭的看法：个人及家庭辅导的一些启示》，《亚洲辅导学报》2000年第7期（第2卷）。

社会福利署：《家庭生活教育服务简介》，2011年4月15日取自：<http://www.family-land.org/>。

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家校会简介》，2011年4月15日取自：<http://www.chsc.hk/>。

家庭议会：《家庭议会简介》，2011年4月15日取自：[http://www.familycouncil.gov.hk/tc\\_chi/home/home\\_intro.htm](http://www.familycouncil.gov.hk/tc_chi/home/home_intro.htm)。

陶兆铭、姚简少薇、蔡冠华：《家长教育的成效评估：设计、量度及相关议题》，载陶兆铭、姚简少薇、蔡冠华、陈廷三编《心路、共步——家长教育论文集》，香港：香港教育研究所，2011。

黄郁文：《亲职教育概要》，台北：千华，1996。

劳贤贤：《家庭教育的内涵及其立法后的推展情况》，《研习信息》2007年第6期（第24卷）。

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部：《亲职教育》，2011，2011年4月15日取自：[http://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lass\\_topic/ct\\_child\\_health/ch\\_parenting.html](http://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lass_topic/ct_child_health/ch_parenting.html)。

简文英、卓纹君：《国内亲职教育团体研究的回顾与分析》，《咨商与辅导》2003年第211期。

Arcus, M. E., & Thomas, J. 1993. "The nature and practice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In M. E. Arcus, J. D., Schvaneveldt & J. J. Moss (Eds.), *Handbook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2, 1-32. Newbury Park: Sage.

Chan, T. S. 2000.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Men's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Fathering Experienc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eung, M. B. 1996. *Report on the Evaluation Package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Parenting Programmes*. Hong Kong: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First, J. A., & Way, W. L. 1995. "Parent education outcomes: Insights into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Family Relations*, 44, 104-109.

Fowers, B. J., & Richardson, F. C. 1996. "Individualism, family ideology and family therapy." *Theory & Psychology*, 6 (1), 121-151.

Furedi, F. 2008. *Paranoid Parenting*. London: Continuum.

Hannush, M. J. 2002. *Becoming Good Parents: An Existential Journe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arman, D., & Brim, O. C. 1980. *Learning to Be Parents: Principles, Programs, and Methods*. Beverly Hills: Sage.

Hills, M. D., & Knowles, D. W. 1987. "Providing for personal meaning in parent education programs." *Family Relations*, 36 (2), 158-162.

Honoré, C. 2008. *Under Pressure: Rescuing Our Children from the Culture of Hyper-parenting*. New York: HarperCollins.

Hwang, K. K. 2001. "The deep structure of Confucianism: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Asian Philosophy*, 11 (3), 179-204.

Johnston, C., & Mash, E. J. 1989. "A measure of parenting satisfaction and efficacy."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18 (2), 167-175.

Lam, C. M. 2003. "Parent education: Revision and vision." *Asian Journal of Counseling*, 10 (2), 147-168.

Lam, C. M. 2005. "In search of the meaning of parent education in the Hong Kong - Chinese context." In M. J. Kane (E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Parenting* (pp. 111-124). New York: Nova Science.

Larson, D. L., Attkisson, C. C., Hargreaves, W. A., & Nguyen, T. D. 1979. "Assessment of client/patient satisfaction: Development of a general scale."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2, 197-207.

Leung, C., Tsang, S., Pang, R., Cheng, W., Chan, S., Lai, A., Ng, A., & Lo, A. 2003. *Parent Education Database in Hong Kong - A pilot Study*. Hong Kong: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Department of Healt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ritas - Hong Kong, Christian Family Services Center, &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Long, N. 1997. "Parent education/training in the USA: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 2 (4), 501-515.

McCubbin, H. I., & Mccbbin, M. A. 1988. "Typologies of resilient families: Emerging roles of social class and ethnicity." *Family Relations*, 37, 247-254.

Ngai, F. W., Chan, S. W. C., & Holroyd, E. 2007. "Transla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 in Chinese mothers." *Nursing Research*, 56 (5), 348-354.

Poertner, J. 1985. "A scale for measuring clients' satisfaction with parent education." *Social Work Research & Abstracts*, 21 (3), 23-28.

Rubin, H. J., & Rubin, I. S. 1995.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The Art of Hearing Data*.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Shek, D. T. L. 2002. "Assessment of family function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Chinese Family Assessment Instrument." In N. N. Singh, T. H. Ollendick & A. N. Singh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Volume 2: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p. 297-316). Amsterdam, Boston: Elsevier.

Shulruf, B., O'Loughlin, C., & Tolley, H. 2009. "Parenting education and support polici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selected OECD countries."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Review*, 31, 526-32.

Solomon, M., Pistrang, N., & Barker, C. 2001. "The benefits of mutual support groups for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9 (1), 113-132.

Tam, W. M., Lam, C. M., Cheng, H. M., Ho, S. C., & Ma, L. C. 2001. "The Promotion of Parent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 Consultancy Study Final Repor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u, W. M. 1985. "Selfhood and otherness in Confucian thought." In A. J. Marsella & F. L. K. Hsu (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pp. 185-230).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Venkataiah, S. 2001. *Basic Concepts of Parent Education*. New Delhi: Anmol.

Webster - Stratton, C. 1997. "From parent training to community building."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uman Services*, 78 (2), 156 - 171.

Wolfe, R. B., & Haddy, L. 2001. "A qualitative examination of parents' experiences in parent education group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67, 77 - 87.

"Working Group on Evaluation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Service." 1982. Report on 1981 Base - line Study on Evaluation of Family Life Education Service. Hong Kong: The Central Guiding Committee on Family Life Education,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 Social Research Cente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